

翻 訳

上海女人和近代女性<sup>1)</sup>作者：竹 内 实<sup>2)</sup>  
翻译：谢 平

有一对生活品味高雅的夫妇，虽住在时尚而忙碌的上海滩二十余年，却从未改变过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丈夫叫李九皋，妻子叫陈素任。

一个91岁，一个96岁，（到2007年为止）他们结婚已经69年了。

李先生是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制作人兼主持。因为说那是个用英语广播的节目，所以极有可能是当时租界的广播台。

李先生接到电话点播的听众中有一个就是陈四小姐（小姐指未婚女性，四是指一个家族同一辈中第四个出生的），她是李先生的铁杆儿粉丝。

性格活泼的她先是学骑自行车，之后学会了开车。有个叫作“中国飞行社”的学校刚刚成立她就入学了，成了飞行社第一批女性飞行员。

上飞机学校不久，有一天她去一个美发厅，剪完头发跟店老板闲聊。在聊到音乐节目主持人李先生时，店老板说李先生是他的同班同学，想不想见个面啊？于是正如她所喜欢的英格兰民谣一样，开始了她的《玫瑰人生》。

**电影和餐馆**

他们的住处附近有一个叫作“洁而精”的川菜馆，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成了那个菜馆的常客，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的座位一直是固定的。

在洁而精吃完午饭后去大光明剧场（现在的南京西路216号）看电影，吃完晚饭后去跳舞成了夫妇俩每天必做的事。有一次跳舞跳了两个小时（舞厅的名字没有记载，若是Paramount Hall，就是现在的百乐门华美娱乐城，位于愚园路218号），李先生突然想到要把去餐馆吃饭的收据收藏起来。

就像纪念邮票似的被保存的收据达到1600张，金额共计58万元。上海博物馆曾将这对夫妇的事情展出，也展出了这些收据，所以这收藏了二十多年的收据在

全中国出名了。

四川菜馆“洁而精”的厨师吕正坤是上海仅四个特级厨师中的一个，影星白杨、王丹凤也常常光顾这个菜馆。陈夫人把腿摔伤后，菜馆还派轮椅接送。洁而精菜馆现在还在（雁荡路82号）。

李先生夫妇也经历过许多辛酸。

文革时李先生被捕入狱，因为租界西洋音乐节制片人的罪名不轻。而且还连累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瑞金医院（取革命圣地瑞金之名，但地点在上海）工作的儿子，儿子被迫害自杀而死。

医院的人来通知的时候，丈夫不在家，正在剥毛豆的陈素任听到噩耗时只回答了一句“谢谢”，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。等来人走了并把豆角儿全部捡起来以后，才哗哗地任凭泪水全部涌出来。

### 上海女性的修炼

上海女性杂志的记者马尚龙认为，这一句“谢谢”表现的正是上海女性的修炼。他这样写道：

不是力量，不是勇气。这是一种在她年轻时就根植于她的心灵深处，并贯通在她血液里的矜持。这种矜持是城市文明培养出来的人文力量，不是用强火快炒出来的，而是用文火，花长时间慢慢地煲出来的。

（马尚龙《上海女人》文汇出版社，2007年<sup>3)</sup>）

马尚龙认为在上海的人文环境下产生的是一种应该称作“上海女人”的类型，就是像三十年代出现的影星阮玲玉、周璇、白杨、张瑞芳、胡蝶等，还有作家张爱玲身上所具有的“洋气”（一种西洋的气质）。

马尚龙说这种气质可以称作“上海女人”，但如果加个“的”，变成“上海的女人”的话却成了另一个不同的概念（出处同前）。

马先生想表达的是“上海女人”这个概念含有一种文化的深蕴。

马先生还提出上海女人的另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嗲”（出处同前）。

虽然词典里解释为“讨好人”，但也应该包括撒娇呀展现女性魅力等举动。

也有人将其比作爱撒娇的暹罗猫。

## 上海女人的忌讳

马先生说上海女人要追求时尚表现出洋气的时候，会连声说“我要，我要，我要要要”，但一旦决定要客气规矩的时候，就会马上说“我不，我不，我不不不”。

她们就是在这些数不清的“不”中成长为“上海女人”的。就是——

笑不露齿，行不露脚；说话慢吞吞，不要急进风；不吵架，不炫耀，不沮丧，不张扬，不插嘴，不失态，不唧唧呱呱，不哈哈大笑，不高谈阔论，不指手画脚，不先动筷，大盘子的菜不连夹两次，不边走边吃，吃东西不发出声音，即使在家里也不穿拖鞋。坐如钟（不动），站如葱（挺直）。

诸如这些禁忌，小时候就被父母教导却不能守，但是长大成人后养成的。当然也有始终无法守这些规矩的女人，只能说那是她们的性格吧（出处同前）。

## 上海的近代女性

上海有过“近代”，至少可以说有过“近代”的萌芽时期。“近代”是通过租界进口的，让人们在消费“洋货”（西洋产品）过程中渐渐觉得“洋派”（洋气的人）也不错。

特别是女性，前面所说的陈素任就是其中之一。从那以后男尊女卑的偏见渐渐被打破。

宋氏三姐妹就是那时期的典型代表，父亲让她们去美国留学，使她们成为会说英语的近代女性，因而三姐妹可以跟各界顶尖人物结婚。

跟蒋介石结婚的三女儿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女推销员（也是第一夫人）到美国巡回演讲，得到了巨额的资助。

女演员胡蝶，虽然不是出生于富豪家庭，但可以说是她促进了新兴产业电影的发展。虽说她是光彩夺目的影星，然而没有经济界、政治界后台关系的她同时经历了“近代”时期的明和暗两面，也许那就是上海近代时期的弱点。

## 宋家三姐妹

而恰恰在必要的时候登场的就是“上海女人”。1943年（昭和18年）访问美国刮起旋风的宋美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
太平洋战争早就开始了，可是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正在抗日战争。宋美龄只

身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，凭着她的容貌、流畅的英语、深厚的英美文学修养、敏锐的机智吸引了听众，引得了美国人对正在抗战的中国的同情和支持。

宋美龄成功地引导了美国舆论，那年她42岁。

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宋美龄的一举一动如同初次登台的少女一样。

完全被征服的罗斯福大总统就像叔叔介绍美丽的侄女一样，叮嘱记者们不要提难以回答的问题去为难她。

总统夫人也像要保护宋美龄似的一边手挡着她的椅子。

然而宋美龄一开口用汉语和英语回答问题，就让记者们确信她无疑就是从亚洲来的第一夫人。

在好莱坞的野外演说大会场，宋美龄与英格丽·褒曼、凯瑟琳·赫本、亨利·方达等都寒暄过，她对好莱坞电影的熟悉和了解令影星们大为惊叹，大腕明星们纷纷捐出了巨额。

巡回途中，夜半时分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的时候，她让女佣穿着自己的衣服与市民寒暄，使得每个市民都非常高兴，简直就像50年后的戴安娜王妃一样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3年10月24日播放·北京，节目不详。马尚龙，出处同前）。

宋美龄有两个姐姐——比她大12岁的霭龄、大8岁的庆龄，还有一个大7岁的哥哥子文。

父亲宋嘉树（字耀如）祖籍海南，原姓韩。后来成为居住在波士顿的叔叔的养子，所以改了姓。

他先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学习，归国后成为一名传教士。之后翻译出版了《圣经》，印发报纸《万国公报》、同盟会的革命宣传刊物，并结识了孙文。他家在朱家木桥（现在的东余杭路），孙文在他家住过，他的孩子也都出生在这里。宋嘉树让他年幼的孩子都去美国学习。

曾当过孙文秘书的大女儿霭龄，留学回来后跟山西省大财阀孔祥熙结婚，那时孔祥熙前妻已逝，而霭龄才24岁（1914年）。

接任孙文秘书的庆龄与孙文产生共鸣，决定与他结婚。父亲极力反对，将庆龄禁闭起来，后来一个女佣帮助她从阳台逃走了。

### 在东京的结婚仪式

到东京的当天，宋庆龄和孙文就在友人梅屋庄吉的家里举行了结婚仪式。他们是在律师和田瑞的陪同下去东京市政府登记结婚的。结婚时，梅屋家的大厅立起了金屏风，屏风的两边摆着插了鲜花的花瓶。

犬养毅、头山满、内田良平、古岛一雄、小川平吉、杉山茂丸、寺尾享、宫崎滔天、萱野长知、佐佐木五郎、廖仲恺及妻子何香凝、女儿廖梦醒、儿子廖承志等六十余人参加了婚礼。梅屋夫人为来宾倒香槟酒，犬养毅引吭高歌庆贺，最后庆龄和孙文朗诵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结束了婚礼。孙文为了和庆龄结婚与原配离婚，这一年孙文49岁，庆龄22岁。

“在宋氏三姐妹的婚恋中，宋庆龄的婚恋最具有理想主义光辉与浪漫主义气质”（时影《民国名媛》团结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
### 宋美龄和蒋介石

三女儿美龄和霭龄一起渡美，从维斯理学院毕业后，回国认识了蒋介石，1927年12月结婚，蒋介石41岁，美龄26岁。

结婚那天，蒋介石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我们的今日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：“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，是有生以来最光荣，最愉快的事情。……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。”

之后宋美龄和蒋介石一起去了南昌，看到南昌市内毫无秩序，肮脏不堪的景象非常震惊，于是建议蒋介石发起“新生活运动”（1934年）。

为什么说她在南昌看到脏乱感到震惊呢？因为她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，后来去美国留学，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生活。所以她要求禁止在街头吸烟，禁止衣冠不整（当时大部分百姓衣不蔽体），推行了“近代化”的生活。

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者，蒋介石强化了与美国的联结，推进了近代化的发展。蒋介石的思想能在美国宣传得开，有宋美龄极大的功劳（《岩波现代中国事典·宋美龄》，作者土田哲夫，岩波书店，1999年）。

赛珍珠的长篇小说《大地》后半部分所写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前进步伐，应该就是新生活运动为背景的。

### 宋氏姐妹的夫君们

蒋介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，介石是字，名中正。在日本陆军部留过学，曾在高田连队做过见习士官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他没有军阀家庭背景，没有实力和财力，也没有自己率领的军队和亲信的部下。归国后，有人说他曾在上海商品交易所出入。他努力接近孙中山，被任命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。那些军校培养的军官成了他的人际关系网，加上与宋美龄结婚，使他成为被社会关注的对象。

宋美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已有婚约，姐姐霭龄劝她解除婚约和蒋介石结婚。

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从美国留学归国后，原在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身边做事，后来进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，担任过工商部、实业部等部长（相当于日本的省大臣）以及行政院长（总理）、中央银行总裁等职。

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是兄弟姐妹中唯一的男子，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进了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，跟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工作的孔祥熙一样，历任各部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、行政院长等职。

就是说，当时在掌握了南京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身边，跟其有姻亲关系的宋氏姐妹的夫君们和兄弟都占据要职。

另外加上直属于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头儿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，垄断政府要职和政治利益的蒋、孔、宋、陈四家被叫做“四大家族”。内战失败给共产党后，国民政府移到台湾（1949年）。后来孔祥熙、宋子文还有蒋介石等人去世后，宋美龄等去了美国。

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，坚持孙中山晚年提出的新三民主义，后来当上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，在弥留之际被授予“国家名誉主席”荣誉。

### 上海电影草创期

前面所述是政界宋氏三姐妹的话题，与此不同的是当时在上海，还有一批代表近代女性的女演员也登场了，就像专门为她们准备舞台似的，那时候电影产业刚刚兴起。

在电影刚刚出现的第二年，虽说电影已进入上海，可那些电影只是把一些未开垦之地的风俗、女人洗澡镜头等接起来的影像，只不过是些供人看的杂耍（1896年8月）。

此后不久在虹口一带有了放映的电影院，而且仅虹口就有十五个影院（1920年）。

在虹口，电影公司还制作了三部有情节的电影：

根据一个真实的事情——痴迷于赛马因无力偿还借款，盯上一个妓女的戒指，最终犯了杀人之罪而制作的《阎瑞生》；描写了一个穷画家和一个富家女儿恋爱故事的《海誓》；表现了赌博内幕的《红粉骷髅》。三部电影都学习美国电影手法，赢得了空前的观众。

这些影片的成功，致使全国各地都出现电影制作公司，其中根据地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占去大半，有142个。观众很快就看腻了现代戏，于是传统故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也被拍成电影。但只两三年观众也看腻了，之后

掀起了武侠片热潮。

男女剑客特别是女剑客很受欢迎，受罗宾汉、三个火枪手等故事启发而制作的片子获得极大成功。尤其是《火烧红莲寺》刚开始只打算拍一部，后来竟一连拍了十八集，深受观众喜爱（1928-1931年上映）。

这部电影由明星电影公司制作，制片人兼导演是张石川，他和郑正秋一起创办了这个电影公司。郑正秋重视的是社会性和启蒙性，张石川重视的则是收益如何。而这部大受欢迎的电影的女主角是后面要谈到的胡蝶。

张石川随心所欲构思了荒诞无稽的情节，影片中还用上了妖魔鬼怪等，让观众们狂热无比。看完后不想上学要到深山里去当剑客的小学生越来越多，成了社会问题，最终被国民政府命令禁止上映（1932年3月1日），热潮终于降温了。

### 战火中的上海电影

上海的电影产业终于到了要发展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（1931年）、一二八事变（1932年），在虹口、闸北、江湾区域的包括明星在内的30个电影公司、16个电影院都被毁坏了。

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，租借地区的革命文学作家、评论家团体痛诉民族危机，各电影公司欲要跟他们共同制作可以营利的电影，于是纷纷委托他们写电影脚本。

在那之前，演技和台词完全要依靠演员的临时发挥和即兴表演。左翼作家之一的夏衍写的脚本，则具体指定了每个场面演员所做的动作和所说的台词。

夏衍的脚本《狂流》是以实际上发生过的长江大洪灾（1931年）作为背景写的，电影加入实况拍摄镜头，还应用了蒙太奇手法，给观众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（图1，1933年3月上映）。



图1 《狂流》的广告（陈文平·蔡维福《上海电影100年》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）

郑正秋导演的《姐妹花》（1933年上映，具体上映月份不详）、蔡楚生的《渔光曲》（1934年6月上映）也获得好评，后者还长期放映，甚至在欧洲也上映过。

新成立的电影制作公司电通策划制作《风云儿女》，负责剧本创作的田汉却被逮捕了，后由夏衍接替了剧本创作（1935年6月上映）。

将要被捕前，田汉把主题歌的歌词草草写在包烟的纸上，夏衍将其给作曲家聂耳看后，聂耳以惊人的速度谱写了曲子。

之后聂耳奔赴美国，途中顺路到了日本，在鹄沼海岸游泳之时，不幸被海浪吞没。那儿现在还立着纪念碑，聂耳享年24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前面所述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，文化大革命时田汉被攻击，长期以来只演奏曲子，但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，也有歌词（2008年8月所见）。

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实行镇压手段，雇佣流氓毁坏了艺华电影制片厂，但上海的各电影公司并不屈服，纷纷上映了《狼山喋血记》、《迷途的羔羊》（以上两部，1936年）、《十字街头》（1937年4月上映）、《马路天使》（同前7月上映）等片子。

女演员白杨在《十字街头》中首次扮演主角，一夜成为瞩目明星，当时才17岁。

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昆走娱乐路线，将三国志的美女貂蝉搬上银屏，制作了有英文字幕的《貂蝉》，获得巨大成功，持续上映了70天，之后还在美国上映。

接着在香港拍摄的《木兰从军》在上海也放映了两个月。

受以上片子的激励，到1941年的四年时间里，上海的二十多家电影公司共制作了250部电影，其中80多部是家喻户晓的传统故事。

不久，现代故事也受到大众欢迎。

## 电影主题歌

当时的电影一定要插入主题歌，这些主题歌作为流行歌曲被传唱。女演员周璇有“金嗓子”的美称，她在40年代出演了几十部电影，还唱电影主题歌，其中有一首《何日君再来》（你什么时候回来）到现在都很有名。

日本向英美宣战之后的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渡过苏州河上的大桥入侵共同租借，四年多的上海“孤岛”时期宣告结束，12家电影公司被迫合并，成立了“国策电影”。

其中《万世流芳》以林则徐烧毁鸦片为主题（1943年5月上映），《春江遗恨》是高杉晋作以千岁丸来上海之事为题材创作的（1942年11月上映）。

演主角的周璇在《渔家女》中的演技及台词，代言了被困在“孤岛”中市民的愤怒（1943年10月上映）。除此以外，还制作了《秋海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教师万岁》、《人海双珠》等片子（1943年-1945年上映）。



战后，电影工作者回到了上海，但由于国民党的严格审查和好莱坞影片的行，没能大力发挥制作。虽然如此，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创作的二百部电影中，80%是在上海制作的。

### 关键词“中华民族”

三十年代中期，日本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呼吁抵抗的是中国共产党，而站在宣传前线的是上海电影界。

抵抗的关键词就是“中华民族”。

起来  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
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
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
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
起来  
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 
前进 前进 前进进

这首歌叫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这时的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，国民党的实权掌握者蒋介石当上了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从那以后，大家为表敬意不呼其名，称他为“委员长”。

### 《何日君再来》

当时的关键词是“民族”，而流行的歌曲却是《何日君再来》。

日军占领上海时期，当时还只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生的刘雪庵，在一次舞会上为跳探戈的朋友即兴作了这个曲子，并没有歌词。

第二年的1937年，艺华影业公司被委托制作一个牙膏的电影广告。虽说是广告，也有情节，女演员周璇担任主演。导演方沛霖想插入主题歌让周璇演唱，所以让担任这个广告剧创作的黄嘉谟（笔名贝林）填写歌词，并给曲子添上了题目。

周璇演的是一个广播台歌手，因为广播台被迫关闭，当上了一个化工厂职员，后跟工厂主的儿子关系密切，在工厂的文艺表演大会上表演了题为《三星伴月》

的戏。

“三星”是牙膏的牌子，是那个工厂的产品。周璇当时唱的就是《何日君再来》。

广告的题名也叫《三星伴月》。歌曲《何日君再来》大受欢迎，成了当时谁都能哼唱的曲子（1938年2月上映）。

不久在香港制作的抗日影片《孤岛天堂》（1939年上映）中有个场景是：在舞厅跳舞的一个舞者以唱这首歌为暗号，把所有的特务一网打尽。很快，这首歌风靡全国。

同年日本诗人长田恒雄将其翻译成日语，由渡边浜子演唱灌成唱片，在日本广为流行。而自称李香兰的山口淑子唱的是中文，也灌成唱片。

然而，日本宪兵队认为“这首歌软弱低迷，使军纪松弛”，禁止军中演唱。

战争时期，租借工部局属日本军统治，他们认为这首歌中的“君”指的是蒋介石、国民党军，也就是说歌词表达的是讨厌日军的意思。他们把录制唱片还登台演出的李香兰叫来审问，正要追究的时候，得知李香兰是日本人非常狼狈。

作曲的刘雪庵虽然在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（满洲事变）以后，创作了很多爱国歌曲，但是在这首歌成名之前一直不受注目。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却因为是《何日君再来》的作者，被戴上了“黄色歌曲创作者”（这时的黄色是低俗的意思）的帽子。

批判右派一开始（1957年），这首歌就被批成是“右派”（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）歌曲、背叛祖国的“反动歌曲”。

这首歌日方认为是爱国（热爱中国）歌曲，而中方（批判右派）却认为是卖国歌曲，这首歌的命运真是不可思议。

### 电影演员胡蝶

上海电影一出现，就开始当演员并一直演主角的是胡蝶。

她在广州时，第一次看的电影是《海誓》，看后她下定决心要当演员。可以说她是在电影产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想当演员了（参照前文）。

胡蝶是她的艺名，她原名叫胡瑞华，出生于上海。在天津一个天主教会学校上学，在广州也生活过，回到上海后常常看电影。

正好那时中华电影学校刚刚成立，她报考并决定了自己的艺名——胡蝶。

毕业后，成为一个叫做天一的制作公司的专属签约演员，出演了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电影《白蛇传》、《孟姜女》等影片。不久，就转到老牌电影公司“明

星”担任主角，也与红人影星阮玲玉共演过。

### 《火烧红莲寺》博得好评

这时候，明星电影公司开始拍摄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原作是极受欢迎的武侠小说，写的是一个少年剑客苦练之后技术高超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

之后导演张石川制作了第二部，片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女剑客，他让胡蝶扮演这个女剑客。

胡蝶上演了惊险的武打动作，按照导演所令，腰系铁丝悬挂空中，有时飞檐走壁，有时在空中飘飞。

因为胡蝶扮演的是一个给观众全新形象的女剑客，于是她开始红了起来，接着拍后续连续拍了4年，竟有影迷想当剑客，最终被禁止继续制作（参照前文）。

明星电影公司的另一个创办人郑正秋从新闻报道中得到启发，制作了《血泪黄花》。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，内容是一个出身名门的阔小姐恋上人力车夫，父亲却雇佣无赖把车夫活活打死（1929年1月制作完成）。

明星电影公司搭建了一个摄影棚用于拍摄武侠片，另外又搭建了个摄影棚用于制作新片。主角都由胡蝶扮演，所以她往来于两个摄影棚之间。这时候阮玲玉等有才能的演员相继离开明星，出色的女演员只有胡蝶了，而且从角色来说都是适合她的。

从那以后，明星公司的电影主角几乎都是胡蝶，随着人们对明星评价的提高，对胡蝶的评价也越来越高。

接着明星公司开始拍摄大片《自由之花》、《啼笑姻缘》，也都由胡蝶主演，在《啼笑姻缘》中她还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。在上海摄影棚的拍摄结束以后，为了拍摄外景，摄影组一共四十多人去了北平，却在北平发生了一件事。

### 与张学良共舞

有一天，拍摄结束后，蝴蝶在宾馆休息时，突然有人请她去吃晚饭。邀请者并没有说名字，但由于张石川的劝说，她就坐上了来接的车。到了前门附近的六国饭店，才知道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及其夫人赵四小姐邀请她。

张学良穿着西服。

在宾馆的大餐厅里，张学良请胡蝶跳了一曲，曲终掌声响起（胡蝶在与张学良共舞之前跟谁都没跳）。之后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跳了一曲。

胡蝶正在那儿发呆的时候，穿着军装的副官急步前来，在张学良耳边说了几

句。顿时张学良脸色大变，对应邀而来的宾客们说有急事要先走一步，张学良走后，副官和赵四小姐也追了出去，于是客人也散了。

就在那晚，在东北发生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也就是“满洲事变”。

几天后，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东北经过北平，并向南方移动。

而胡蝶结束了在颐和园和香山的外景拍摄，回到了上海。上海各报社将在六国饭店跳舞的张学良和胡蝶的大张照片登在报上，并配上“张学良和九·一八的晚上”、“不爱江山（祖国）爱美人”、“红颜误国”等大标题。

正当此时，蝴蝶与丈夫离婚，与潘有声订了婚约，开始同居。

张学良不抵抗日军是出于蒋介石的命令，但是蒋介石并不公开声明，张学良也不作辩解。胡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对煽动的流言表示抗议。

明星公司由于制作电影《啼笑姻缘》时违反了国民政府的手续，出现难以收拾局面，只好借用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力量。胡蝶勇敢地参加了邀请杜月笙的宴会，使明星公司闯过危机。

1933年1月，电影报纸《明星日报》发起的评选电影皇后（明星皇后）的活动中，胡蝶获得21334票，位居第一（图2<sup>5)</sup>）。第二位陈玉梅获得13028票，第三位是阮玲玉，获得7290票。



图2 胡蝶 左脸颊的酒窝最受人喜爱。（《上海电影100年》）。左边的相片由古市雅子女士提供。

胡蝶拒绝参加选中影后的庆祝活动，却参加了呼吁为抗日航空飞机捐钱的慈善集会，她把当天的收益全部捐给了航空援助救国协会。

## 戴笠的圈套

战火蔓延，胡蝶一家只好移居香港。

日本向英国、美国宣战，蝴蝶又离开香港，经由桂林到了重庆。

她逃离香港的时候，把衣物纪念品等装了三十个箱子，将其委托给秘密负责帮助逃离工作的朋友，却遭强盗袭击，没有运到。因此她在重庆时经济拮据。蒋介石的心腹，管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头子戴笠知道了，伸出了救援之手。

戴笠原来就是胡蝶的影迷，曾在重庆的电影院反复看《火烧红莲寺》等片子。

但是戴笠让胡蝶一家住在自己的公馆里，还给他们请了厨师和佣人。甚至还找关系给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在昆明找了工作，一步一步逼迫胡蝶。之后他还企图让胡蝶和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，但是就在1946年3月17日，戴笠飞机失事遇难。胡蝶被囚禁两年终于获得自由，回到了上海家人身边。

1946年秋，胡蝶一家又移到香港，1975年移居加拿大。她于1989年4月23日在温哥华去世。

据说她的最后一句话是：胡蝶要飞走了。享年78岁（张娜鑫《胡蝶传奇》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
战争时期胡蝶经历的辛酸让人感到十分心痛，但她作为电影演员深受大众喜爱，并度过了幸福的晚年。

不幸自杀身亡的影星有艾霞、阮玲玉。

艾霞自编自演的片子有《现代一女性》等，但她被嫉妒，于1934年春节自杀，那年她22岁。

以艾霞一生为题材的电影《新女性》的主演阮玲玉，因报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，留下“人言可畏”的遗言，于1935年3月7日服毒自尽（就是国际妇女节的前夜），享年25岁。

## 注

- 1) 本文原载『中国という世界一人・風土・近代』（竹内实著，岩波書店，2009年2月20日）第9章（179～202页）。
- 2) 竹内实（1923年6月12日—2013年7月30日），出生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。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，京都大学名誉教授，被称为“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”。
- 3) 引用处基于日语意思翻译，可能与原文不同。
- 4) 原文为“图62”，参看原书191页。
- 5) 原文为“图63”，参看原书200页。